

对二元增长模式的反思: 基于发展的导向

韩喜平, 杨 艺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长春 130012)

摘要: 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演进的必经阶段。中国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在快速初步奠定工业化基础的同时, 强化了二元经济结构。改革开放以来, 虽然政府充分认识到消除二元经济结构的重要意义, 但适应当时社会发展需要的增长导向导致二元结构出现了削弱——强化的多次反复。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必须破除二元经济结构, 为此要建构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农村经济的经济运行机制。

关键词: 增长模式; 发展导向; 二元经济结构; 城乡结构; 农民收入

中图分类号: F045.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2X(2010)03-0164-03

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城乡生产和组织的各种不对称性, 是发展中国家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演进必经的过渡形态。破除二元经济结构, 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中国的国民经济结构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 经济中存在的很多长期性问题无不植根于二元经济这一基本特征^[1], 理论界普遍认识到要发展农村经济, 必须优化资源配置, 加快二元经济结构转换^[2], 政府也一直致力于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多项研究表明,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不仅在改革开放前日趋凸现, 而且改革开放之后还出现了削弱——强化的多次反复, 这种突出性和不稳定性说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存在的顽固性, 这就要求我们深刻认识破除二元经济结构的意义并重新审视推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具体对策。

一、结构形成与增长导向

“二元经济”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荷兰经济学家伯克(J. H. Boeke)在对印度尼西亚社会经济结构状况描述过程中使用的。他认为, 该国经济和社会可以划分为传统和现代两个部门, 在这种非同质国家的经济社会中, 推行单一的经济政策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把二元经济结构最早引入经济增长模型的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Lewis 1954), 他认为,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必然会出现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并存的状态, 这种二元经济的显著特征是: 传统农业部门存在着大量的剩余

劳动力, 工业部门只支付略高于农村维持生计水平的工资, 就会诱发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 实现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与利用, 推动了现代工业的扩张; 同时, 在边际生产力为零的假设下,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并不减少农业总产出, 而且能够促使农业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提高, 由此推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刘易斯模型后来被费景汉和拉尼斯(Ranis 1964)进一步发展, 他们把边际生产力大于零但小于平均产出的失业者也归于剩余劳动力范畴, 认为二元经济成功发展的关键, 是工业部门吸收率必须大于总人口(或劳动力)的增长率, 工业劳动力增长速度是二元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绩效指标。“对工业部门劳动力吸收的任何分析, 均等于考察决定工业部门在长时期对劳动力的需求曲线的水平和位置的各种力量”。^[3] 这些力量包括: 工业资本积累率, 创新强度, 创新的要素使用倾向, 劳动报酬递减率和工业工资增长率。工业资本积累率和创新强度的提高, 会推动劳动力需求曲线右移; 创新的劳动力使用倾向, 劳动力边际报酬率作用减弱, 可以使劳动力需求曲线变得平直, 这些均有利于提高工业部门劳动力的吸收率, 而工资增长率不变也保证了工业劳动力的不断增加。同时, 促使经济得以保持持续发展的关键是提高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以获取更多的农业剩余。刘易斯和费景汉、拉尼斯理论模型的最有创造力的地方在于: 只要对传统部门存在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进行再配置,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就可以启动, 在这一配置中会产生经济的持续发展机制^[4]。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出现于建国之前。19世纪中叶以后, 较先进的近代工业进入中国, 冲击了传统农业经济, 形成西方较为先进的近代工业与中国封闭落后的传统农业经济并存的格局, 国民经济开始呈现二元结构的总体特征。但实事求是地讲, 建国前, 封闭落后的传统经济占据

收稿日期: 2010-02-01

作者简介: 韩喜平(1965—), 男, 内蒙古巴彦淖尔人, 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 杨艺(1962—), 女, 吉林长春人, 副教授, 博士研究生, 从事经济问题研究。

统治地位,1949年,工业总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0%。中国最为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形成于建国后,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在工业部门快速发展的同时,农业部门发展缓慢,导致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迅速拉大,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凸显。

历史的回顾,使得我们认识到中国的二元经济模式形成既有着发展中国家的共性,又有着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殊性。一些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形成是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转化的正常发展过程,正如配第一费雪—克拉克定理所描述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次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逐渐下降;第二次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上升,经济进一步发展,第三次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也开始上升。而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是由于解决“新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特殊性和两难问题”而人为推动的。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必须加快工业化的建设步伐,而无论是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还是马克思经济理论,都需要原始积累。由于没有时间允许中国有序地经过轻工业—基础工业—重工业的发展阶段,只能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依赖农业进行积累,通过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利用农业“剩余”支撑工业化所需资金。1952—1978年,国家依靠农业积累的资金达4452亿元,年均约171亿元,占国民收入积累额的比重除1978年外都在30%以上。建国初期资本稀缺和劳动力丰富的资源状况,决定了不可能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去实现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优先发展,而必须依靠政府强制性的制度安排。从1953年起,还实行了农产品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和户籍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安排,这三项制度的实行,阻断了产品、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

这种人为推动的发展模式,取得了一定的历史功效,保证了工业化初期所需的资金积累和其他资源的供给。1952—1978年,农业产值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57.7%降到32.8%,工业产值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9.5%升到49.4%。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对工业积累、国力的增强、军事工业和航天工业的快速发展是成功的。但在增长模式下,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经济、社会结构并未随之得到优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在政策的作用下进一步固化。首先,由于重工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差,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伴随工业化转移到非农产业,使农村沉淀了大量剩余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优化配置,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其次,对农业抽取过多,投入过少,导致农业基础设施落后,生产效率低下,农副产品长期供不应求,农业生产长期低速增长,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缓慢。

二、调整波动与增长主导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化转换是基本趋势,但这种转换不是持续进行的,而是经过了削

弱——强化的多次反复。

1978—1984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减弱,农业每年保持了7.7%的增长速度,农业产值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由32.8%提高到39.8%,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78年的2.57:1降至1984年的1.84:1,呈现缩小的趋势,两部门劳动生产率差异和城乡差异逐年缩小,城乡经济结构的二元性明显减弱;1985—1992年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又出现强化趋势,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85年的1.86:1升至1992年的2.58:1;1993—1997年城乡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又开始减弱,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呈现缩小趋势,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94年的2.86:1降至1997年的2.47:1;1997—2001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再次强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呈现扩大趋势,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97年的2.47:1升至2001年的2.90:1。总的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两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喇叭口”在逐渐缩小,说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是基本趋势,但这种转换却经过了削弱——强化的多次反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复?全面审视中国这一阶段的发展战略,我们发现其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的发展战略依然是以增长为导向,而非以发展为导向。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解释,所谓经济增长是指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重点强调总量;而经济发展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实际福利的增长过程,不仅是社会财富在量上的增加和扩张,还意味着质的变化和发展,即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变化,投入产出效益的提高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增长为导向的模式是以强调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为主要目标的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这样的增长模式有着历史必然性,也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扭转“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状况是进行改革开放最为直接的动因。邓小平明确指出,加快经济发展成为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最基本标志和最迫切任务。“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在这种符合历史要求的思想指导下,经济增长的政策安排显然是为了尽快地增加经济总量,一切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条件、手段都在经济政策中得以彻底贯彻,如在区域发展战略、分配制度等各方面都实行了不平衡发展战略,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调整二元经济结构而言,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函数,在发展中国家投资是增加总量最迅速的方法,投资见效最快的显然是工业,工业项目财政增收效果比较明显。这一阶段,国家重点增加对工业的投资,对农业发展的投入也主要是为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物质基础。1991—2003年,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0.26%下降到7.12%,支农支出从7.19%

下降到 4 %。同时,国家实行城乡分割的公共品供给制度,城市区域的公共物品由国家负担,农村地区的公共物品由农民自己负担,农村居民除了交农业税,还要交村提留、乡统筹。1985年取消农村教育补贴后,农民每年负担的教育经费高达 500 亿元;1990年全国社会保障支出 1 103 亿元,其中城市社会保障支出 977 亿元,占支出总数的 88.6%,农村仅支出 126 亿元;城市人均 413 元,农村人均 14 元,相差将近 30 倍;国家财政在卫生事业费中用于农村合作医疗的补助费 1992 年为 3 500 万元,仅占全国卫生事业费的 0.36%;国有商业银行的纯粹商业化改革,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的减少,使农村和欠发达地区不仅融资困难,而且资金不断外流。在这个阶段,工业增长率明显快于农业,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出现多次反复。

按照经济常识,缩减二元经济结构主要依赖政府的调控。而我们注意到,这一阶段城乡收入差距两次缩减反而恰恰是市场带来的。1978 年的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这种制度变迁构造了新的激励机制,经营成果与农户收益直接挂钩,从而使农户产生寻找更有效利用土地及其他生产要素的激励,提高了农业要素资源配置效率,优化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中国农业保持了年均 7.7% 的增长速度,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政府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价格,从 1979 年夏粮上市开始,提高粮、油、猪、棉花、木材等 18 种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直接促进了农民收入的提高。当工业发展、城市发展也开始市场化改革时,农业的弱势性很快表现出来,城乡收入差距再次扩大。

1992 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的价格形成机制和价格运行机制,逐步建立健全以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为主、行政调控手段为辅的价格宏观间接调控机制。1992 年提高了粮食销售价格,实行购销同价;1994 年和 1996 年两次提高了粮食购销价格;1993—1995 年连续 3 年提高棉花价格,带动了农民收入的增加。但当价格提高刺激了产量提高后,国家并没有采取保护农民利益的措施,1998 年针对棉花过剩的情况又较大幅度地降低了棉花购销价格,而且全面推行生产资料价格并轨,逐步提高电力、石油、铁路运价,缓解基础产品价格长期偏低的矛盾,致使刚刚出现的二元经济结构缩减的趋势再次得到强化。

三、城乡统筹与发展导向

1. 进一步充分认识增加农民收入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在投资为主导拉动经济增长的时期,农村具有食品、劳动力、资本、外汇等多重贡献,计量分析表明,在改革期

间 GDP 的增长中,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的贡献率为 2% (蔡昉、王德文,1999)。在投资主导向消费社会转换的过程中,如果农村落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就难以拉动消费,必将影响社会总消费水平的提高。近年来,中国消费率持续偏低且提升乏力,其重要根源在于农村消费不足,农村市场化发展缓慢也将制约整体市场化进程。中国经济整体已进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阶段,即由重视经济总量的扩张发展到重视环境、公平、社会福利提高的阶段,由重视经济发展到重视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阶段,由重视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到重视生产要素市场体系建设与完善阶段。但目前农村经济仍停留在市场化中期,商品化、货币化、信息化、知识化仍不充分,抑制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进程。只有农民富裕,社会才能和谐、发展,所以我们一定要破解制约农民收入提高的外部因素,加强财政对农业部门的支持力度,推动农民收入增加。

2 进一步认识农村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城市化的重要意义

城市化是社会演进的普遍规律,但要很快使中国农民全部进城既不现实,也没必要。现实的选择应当是通过农村的兴旺为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促进城市发展、城乡互动、协调推进。近代世界历史的发展经验也表明:社会转型时期,如果农村发展出现停滞,矛盾激化,将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动荡。西欧从 15 世纪中叶开始转型,农村经济经历了约 100 年左右的发展。从 16 世纪中叶开始,各国政府为了加强王权,扩充军备,不断增加税收,甚至向普通佃户加收地租,造成许多普通农户的破产,到 17 世纪农村经济已出现停滞,引起西欧各国国内的动荡,拖延了西欧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国政府实行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系列政策主张,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制度安排,要从根本上调整城市与农村之间、非农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格局,实现经济和社会资源从城市和非农业向农村和农业流动,为农村提供公平的公共服务,建设繁荣和安居乐业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参考文献:

- [1] 陈宗胜,钟茂初,周云波.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与农村经济增长和发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6
- [2] 黄泰岩,王检贵.从城乡收入差距看扩大内需的政策选择[J].宏观经济研究,1999,(6):47-50
- [3] 费景汉,拉尼斯.劳动力剩余经济的发展[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75
- [4] 郭剑雄.农业人力资本转移条件下的二元经济发展——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的扩展研究[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1):93-102

[责任编辑:孙浩进]